

罗根泽 著

中國文學批評史



1206.09

7=2

2:1

1137 / 15

中國文學批評史

—

羅根澤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156365

274

中国文学批评史

—
罗根泽 著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环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4,000

1984年8月新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700

统一书号: 10186·429 定价(七): 0.95元

重 印 说 明

罗根泽，字雨亭，河北省深县人。生前历任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他早年即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本书是他长年研究的成果。全书上起周秦，下迄两宋，多撰写于抗日战争前后，曾分册出版多次，后经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一九五七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又曾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新一版印行。

本书以资料详赡、排比有序见长，在目前行世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另具特色，足资参考。罗先生曾在一九五七年《新版序》和一九五八年《重印序》中对其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有所阐述，以之与《旧序》参阅，更可见其学术思想的进展过程。他本有志于续写明清部分，惜一九六〇年不幸患病去世，未能完成此一意愿。

现利用中华上编一九六二年版的旧纸型重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四月

重 印 序

去年新版付排的时候，本来就打算仿效郭沫若先生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附上一篇自我批判式的序言。惜值臥病医院，力不从心，結果只写了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新版序，声明：对旧版虽略有修改，但“仍保存了原来的組織和面貌”，一般受解放前、抗战前自己旧观点局限的地方，沒有改动。又声明：“对时代意識的关系，我非常的強調并注意分析，但对更有关系的阶级意識却注意不够，虽然有的地方也注意到了。”

在解放前、抗战前，我是在用什么旧观点来写中国文学批評史呢？在旧序里，我說：

故今茲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詭；蒐覽务全，銓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見，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貽誤来者。

在緒言里，我又說：

編著历史者，必需祛除成見。……祛除成見才能客觀。

很显然，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小資产阶级的客觀主义。錯誤是严重的，所以解放后一开展学习，我就首先提出对这种观点的自我批判。后来又在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和治学方法一文里說：“在解放前，我長期的陷在客觀主义的泥淖里。通过这次对胡适及俞平伯先生的研究紅樓夢的批判学习，当更深刻檢查，随时警惕。”

其实呢，早在1894年，列宁就在民粹主义的經濟内容和司徒盧威先生的著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这一經典著作里，对小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有严正的分析 and 批判。他說：

客观主义者談論某一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則精确地确定某一社会經濟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性关系。客观主义者在証明某些事实的必然性时，常常糾纏到替这些事实辯护的观点上去；唯物主义者則揭露阶级矛盾，并借以决定自己的观点。客观主义者談論“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唯物主义者則談論那“管理”特定經濟制度，并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由此可見，一方面唯物主义者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完滿地实现自己的客观主义。他不仅仅限于指出过程的必然性，而且还要說明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經濟形态提供这一过程以内容，到底哪一个阶级决定这一必然性。……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是具有所謂党性的，因而它在对事件作任何评价时必须率直而且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观点上。

是的，我只是喜欢追寻某一文学理論批評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的現象，却没有想到“还要說明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經濟形态提供这一过程以内容，到底哪一个阶级决定这一必然性”。更没有能“揭露阶级矛盾，并决定自己的观点”。相反的，恰巧是“常常糾纏到替这些事实辯护的观点上去”，認為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更严重的，有的地方，特別在周秦兩汉部分，因为写的時間最早，甚或流于主观唯心論。如对孔子的所以以功用的观点說詩，認為是由于他是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对孟子的不能正确的“以意逆”詩人之“志”，認為是由于他的“講道德，說仁义”。实则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的由于他倆都出身封建阶级，都站在维护封建阶级利益，整頓封建阶级陣容的观点来理解詩、要求詩，所以才一則希望“詩无邪”，一則硬以封建儒家所提倡的“仁”“孝”的观点

来“逆”詩人之“志”。

追寻文学理論批評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現象的例子，如对李商隐在韓柳提倡載道的文学以后，他特別提倡緣情的文学，認為必然有反对載道的言論。反复寻找，找到了，他在上崔华州書說：“夫所謂道，岂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笔为文，不能攘取經史，諱忌时世。百經万書，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其高下哉？”又如对宋初文人在經過晚唐五代，韓柳李杜的作品遭受散失、声名亦被压抑以后，大家都来搜輯学习，認為必然有鮮明的口号，东找西找，找到了，王禹偁在贈朱严一詩說：“誰憐所为还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宋代部分未印）。可是找到了就認為“万事大吉”，沒有再想到更精确地确定这是由于什么階級阶层的意識与力量来决定这一必然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所产生的对抗性的关系，更沒有想到研究这一必然性在历史上起了促进或促退的作用，虽然对李商隐的反道緣情，也籠籠統統地說“除了社会的大原因以外，与他的身分有关”。

認為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而“糾纏到替事实辯护的观点上去”的地方，那就更多了。如对元稹、白居易的放弃鼓吹并写作“諷諭詩”而轉于鼓吹并写作“閑适詩”和“艳詩”，从标题的“触忌与退轉”，就知道是在替他倆辯护。不錯，触忌被迫的因素是应当指出的。但这指出的矛头应指向統治階級对进步作家、进步理論家的迫害。与此同时，还必须再抛出一把矛头，指向元白本人的由于出身封建階級而帶來的先天的軟弱性与兩面性，缺少坚持斗争的勇气。我在臚列了迫害的事实以后說：“无情的貶謫，使他倆認識了执政者的厉害，認識了时政的不容人补察。由于个人的勢小力微，不敢再倡导社会詩了。为了保全性

命，只有退轉的一个办法，由是元稹轉于艳情，白居易轉于閑适”。对統治阶级沒有明确地批判，对元白更只是一味地曲予辯护。

还有不是对一个人的退轉蛻变的理論，而是对一些人的腐化墮落的理論，也往往認為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糾纏到替这些事实辯护的观点上去”。如叙述晚唐五代的文学論时，先自唐代社会的变迁說起，認為有三次变迁崩潰，到第三次——即黄巢起义时的总崩潰以后，文章家和詩人，都怨于过去“救世刺世的都不見容于世”，“大半都放弃救世与刺世，而返回来救自己；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学，变为自娛娛人的文学”。这样，就把他們的鼓吹墮落的緣情、隱逸、香艳、清丽的理論，都推到“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都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而反艳丽，呼吁文章喪亡的进步的理論，也就只能和他們相提并論，沒有得到应得的崇高地位，同时现实主义对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也就不能显豁地呈现在讀者面前。

也是由于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学者，象英国的森次巴力的把文学批評的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繹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鉴的、审美的十三种，在緒言里，一方面虽指出“不够”，一方面又吸收来列入“批評的方法”。其实，作为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同样也是在緒言里，还引列了小泉八云和法朗士的說法，毫无批判地作为論据，也都有問題。

另外，五四以后，流行过一种說法，不是从表现形式和方法的不同来区别文学作品和哲学論文，而是說文学作品是在表达情感，哲学論文是在表达思想。有的地方，特别是周秦兩汉部分，我也沿襲了这种錯誤。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这句名言，我在緒言里征引过了，并且說：“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以傳統的載道的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傳統的載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緣情观念而已。”又說：“果然，时移事改，五四的曲解历史，又被我們知道了。”應該承認，我那时知道的还很模糊。事实上，研究历史——不論一般的通史或学艺專史，如不依据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有确切的分析与論述。許多写書的同志大都計劃着先由簡略而后扩充到詳贍，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計劃，打算“由博返約”，先写逢說就錄的資料較詳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評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資料写一本簡明的中国文学批評史綱要。由于抗战期間的沒有能續写，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評史沒有写完出齐，簡明的中国文学批評史綱要也更当然未曾編写。現在拟先写論第三、四兩册，然后再回过头来修改第一、二兩册。“学术是公共的事业”，在旧社会这只是一个虛伪的口号，現在則这一口号已大大地不够了，應該进而理解为是“人民的事业”。事实上，它确是人民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希望大家来共同鑽研。“医不自治”，对旧稿也希望大家“会診”。

1958.8.17

新 版 序

这部書打算分訂四冊，現在出版的第一、二冊都是解放前編寫的。更确切地說：絕大部分編寫于抗戰以前，極少章節編寫于抗戰初期。

一九三四年，曾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內容只限于周秦漢魏南北朝。後來一面修改，一面續寫，到一九四三年，改由商務印書館重排，分別題名：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和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四本書。現在的新版，第一冊包括前兩本，第二冊包括後兩本。

關於怎樣輯材和編寫，已詳舊序和緒言，這裡不再一一重述。這裡應特別申明的是：既然編寫在解放以前、抗戰以前，限于自己——特別是那時的水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點。現在對自己能發現和同志曾經指出的錯誤，作了一些修改。但仍保存了原來的組織和面貌，對一般的受那時觀點局限的地方，沒有改動。在緒言里，我希望能由看到相當多的時代意識，而擺脫當時的時代意識。現在看來，這只能做到不抹煞過去的時代意識，卻不能完全擺脫當時的時代意識，也難以超越當時的時代意識。例如對“載道”和“緣情”的問題，我雖希望不沾沾于一種觀念，但事實上仍接受了“五四”時代認為文學是感情產物的影響。又如對時代意識的關係，我非常的強調並注意分析，但對更有關係的階級意識卻注意不夠，雖然有的地方也注意到了。

王国維先生著宋元戏曲史，自序說：“凡諸材料，皆予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予之所創獲也。”在我編写此書以前，已有陳鍾凡、郭紹虞兩先生的兩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還有方宗岳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和日人鈴木虎雄先生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如旧序所說，我皆曾參閱，得到很多启发。但旧序也說過了，自文集、筆記，以至群經、子、史、總集、詩集，我都“不敢自信記誦，不得不一一紬繹。”然后又如緒言所說，我採用“混合體”的體裁方法，分別的就批評家、批評的對象；以及提出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方法、批評理論和批評方法，彙集分析，写成篇章，對讀者的參考，或不无方便。人文版和商務版都得到過許多同志的著文批評或惠書指教，除在此申謝外，希望新版得到的批評指教，能更多更广。已故文字學家兼書法家錢玄同教授，曾為人文版題簽，現复制以資紀念。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大學。

舊 序

余少好子集之學，長有述作之志。諸子百家，則作探源以辨正偽，作集注以明訓詁，作傳論以考行實，作學案以闡義理。歷代文學，則先錄文學家傳記集，再作文學家列傳，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類文學史，再作文學史類編，以疏文學源流；先輯文學批評論集，再作文學批評史，以探批評奧蘊。資賦駑鈍，人事倏擾，年至不惑，學無一成。探源傳論，成書不全（傳論止成孟子一種，商務印書館出版；探源較多，單印者有中華書局出版之管子探源，余則收入開明書店出版之古史辨第四、六兩冊）；集注學案，汗青無期；文學家傳記集則舊錄已佚，新錄未終；各類文學史，則樂府悔其少作（北京文化學社出版），他亦不欲問世；批評論集則充溢篋笥，徒自賞玩；批評史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差敢寫付梓人耳。

蓋莊周論道，蘄察“古人之全”；荀卿勸學，必解“一曲”之蔽。況乎史之為書，職司載述，不該不徧，不足語于實錄；予取予奪，何得稱為直筆？至春秋立褒貶之義，史記成一家之言，斯則以孔子憫道不行，筆削以垂訓，馬遷受辱發憤，纂著以自明。後人無孔子之聖，馬遷之賢，而妄以支離卑痺之說，謬附筆削一家之言，未有不如下王通續經，見詆通人者也。故今茲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詭；蒐覽務全，鉅敘務公，祛陰陽偏私之見，存歷史事實之真，庶不致厚譏古人，貽誤來者。

一九二七年秋，負笈清華大學研究院。越明年，至開封，任河南大學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學。一九三一年春，即返北京。從此迄一九三七年蘆溝事變，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慶，任教安徽大學，餘皆寄居北京，前後七年有半。北京多公私藏書，余亦量力購求，止詩話一類，已積得四五百種，手藁秘笈，絡繹縹緗，閑窗籀讀，以為快樂。最珍貴者，有明刊本宋人蔡傳吟窗叢錄，明人胡文煥詩法統宗。二書皆詩學叢書，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詩格詩句圖甚多，得以分述于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後之文學批評，頓然炳蔚。其有公私珍藏，不能割讓，或割讓而索價太昂，則傭人繕寫，亦積得數十冊。聞沅叔先生藏有永樂大典本詩話數種，未及借鈔，變起倉皇，至今猶于邑于懷也。又以詩話盛于宋，而宋人詩話，泰半亡佚，與內子曼漪，從苕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詩林廣記及諸家筆記中，輯出數十種，顏曰兩宋詩話輯校。事變後，浮海南來，道出徐濟，南至南京，北返開封，然後西走長安，又隨西北聯合大學，播遷漢上，雖續有所得，而博考無從。聞中央大學自京移渝，載書頗富，遂於一九四〇年一月，由陝入川，重理叢殘，際國步艱難之日，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誠不勝悲喜交集矣！

竊嘗以謂古昔賢俊，學貴博綜，運思含毫，吐納萬象，舉凡天地之大，蟲魚之微，幽明之情狀，古今之嬗變，以至六府三事，眾技百家，莫不隨意陳辭，卽事為篇。摘金振玉者，最為文集；布夾達指者，彙為筆記。文集筆記者，儒先績業之總萃，而文學批評亦寓藏其中。此外則群經子史，總集詩集，品藻之言，亦往往間出。余性魯慙，不敢自信記誦，不得不一一紬繹。清顧炎武謂著書譬猶鑄幣，宜開采山銅，不宜充鑄舊錢。文學批評史之山銅為詩話文論，而文集筆記則為沙金；因彼開卷已得，此必排簡始

見也。

日月遄邁，駭拙濡滯，肇造迄今，忽將十稔。始以講授清华大学，策蹇疾書，草成一至三篇；秋間增刪復講，翌年筆削付印（北京人文書店出版，事變後書店停業，印出之書，付之一炬）。而四、五兩篇，又在师范大学，講習編著，亦陸續脫藁。六篇以下，屬寫未竟，抗戰軍興，北京淪為異域，已梓三篇，亦全數焚毀，故哀集董理，重託剞劂。陳鍾凡、郭紹虞兩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方宗岳先生中國文學批評，日人鈴木虎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皆曾參閱；朱自清、朱東潤、汪辟疆、李翊灼、李長之、胡小石、吳世昌、樓光來、黎錦熙、劉盼遂、劉汝霖、儲皖峯諸先生，皆曾商正；匡啟之誼，所不敢忘。漢班彪論馬遷史記，“采獲今古，貫穿經傳，一人之力，文重思煩，故刊落不盡，多不齊一。”矧余不材，寧免疵累？世有君子，可覽教焉。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自序于渝郊。

目 录

重印说明

重 印 序

新 版 序

舊 序

第一篇 周秦文学批評史

第一章 緒言	3
一 文学界說	3
二 文学批評界說	5
三 文学与文学批評	10
四 文学史与文学批評史	11
五 中国文学批評的特点	13
六 文学批評与时代意識	16
七 文学批評与文学批評家	18
八 文学批評与文学体类	20
九 史家的責任	21
十 历史的隱藏	23
十一 材料的搜求	25
十二 选叙的标准	26
十三 解釋的方法	30
十四 編著的体例	32
第二章 詩說	35
一 詩人的意見	35
二 古詩的編輯	36

三 春秋士大夫的賦詩	37
四 孔子的詩說	38
五 孟子所謂“以意逆志”与“知人論世”	40
六 荀子所謂“詩言志”	42
七 墨子的用詩	42
八 詩与乐	43
第三章 “文”与“文学”	45
一 古經傳中的辞令論	45
二 最广义的文学	46
三 孔子及孔門諸子所謂“文”与“文学”及“文章”	47
四 孟子所謂“养气”与“知言”	49
五 荀子的立言論准	50
六 易傳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	52
七 墨子的“三表法”及其重質的文学觀	54
八 晚出談辨墨家的論辨文方法	56
九 老子的反对“美言”与提倡“正言若反”	60
十 庄子書中的艺术創造論、写作方法論及書文糟粕論	61
十一 韓非的反对文学及解老篇的重質輕文	66

第二篇 兩漢文学批評史

第一章 詩的崇高与汨沒	71
一 詩的崇高	71
二 詩的汨沒	72
三 衛宏毛詩序	74
四 郑玄詩譜序	78
第二章 “文”与“文章”及其批評	81
一 文学文的兴起	81
二 所謂“文”	81

三 所謂“文章”	84
四 楊雄的意見	86
五 王符荀悅的意見	88
第三章 对于辞賦及辞賦作家的評論	90
一 辞人的意見	90
二 刘安司馬迁的批評	91
三 司馬相如的“賦心”与楊雄的“賦神”	94
四 汉書艺文志的辞賦分类	95
五 “爱美”“尚用”的冲突与融合	96
六 諷諫說	98
七 諷諫說的作用及价值	100
八 諷諫說下的作家批評	102
第四章 王充的文学批評	104
一 王充在中国文学批評史上的地位	104
二 王充的精神及其背景	105
三 王充所最崇拜的桓譚	107
四 “尚文”与“尚用”	109
五 “作”与“述”	112
六 “实誠”与“虚妄”	114
七 “言文一致”与“文无古今”	116

第三篇 魏晉南北朝文学批評史

第一章 文学概念	121
一 文学含义的淨化	121
二 文学概念的轉变	123
三 文学价值的提举	124
四 社会学术的因素	127
五 葛洪的反古与提倡深美博富的文学	131